

王元化 主编

海外 汉学 丛书

【美】司徒琳 著

南明史

一六四四——一六六二

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元化 主编

海外汉学丛书

南明史 一六四四——一六六二

【美】司徒琳 著

李荣庆 郭孟良 卞师军 魏林 译 严寿澂 校订

上海古籍出版社

沪新登字109号

Lynn Struve

The Southern Ming, 1644—1662

本书据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84年英文版译出

海外汉学丛书

主 编 王元化

丛书常务编辑 王镇远

本书责任编辑 郑明宝

丛书封面设计 任 意

海外汉学丛书

南 明 史 (1644—1662)

[美] 司徒琳 著

李荣庆等 译

严寿澂 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插页 2 印张 12.375 字数 250,000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25-1187-1

K·112 定价: 6.10元

中文版序

朱 维 铮

十七世纪中叶的南明，其实是四个或五个抗清政权的统称。它们都无例外地抬举明帝国某个亲王充当领袖，彼此间却并没有承袭关系。每个政权的生存时间，短的不过一两年，长的也仅十来年。通计不到二十年，只可称作历史的瞬间。

历史也真古怪。有时上百年过去了，留下的记录平淡无奇。但有那么若干瞬间反而在后世会激起回响，并且引发历史学家们不倦的探索兴味。

南明史便显然属于这样的瞬间。

还在本世纪初，那些愤恨清朝腐败统治的年青知识分子，在“排满革命”的名义下发誓为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而战的时候，如何从南明的历史先例中间汲取自己的革命诗情，已是众所周知的。

然而，诗人的愤怒，不能代替冷静的历史研究。清末最热心歌颂南明为抗清而献身的忠臣义士事迹的，莫过于往往也是光复会成员的南社诗人们。但也正是这些以浪漫主义的热情为民国催生的青年们，在他们梦寐以求的反清革命成功后，发现迎来的不是“汉官威仪”，而是旧污陈垢装点的“假共和”。希望幻灭了，痛心疾首的悲吟代替了斗志昂扬的高

128th

127072

歌。随着诗人的沉默，由近及远的历史沉思变得凸显，那远点便在明清之际。

事实上，南明最后一个政权刚刚化作历史，关于南明历史的反思便已开始。清初江南相当一批学者在这方面都是有心人。新兴的帝国当局对于此种努力日感疑惧，终于在以宽容异端著称的康熙皇帝晚年，一次株连达数百人的史狱，使得南明史研究从此成为禁区。待到十八世纪后期乾隆皇帝出于实用的考虑，将当年曾为清朝统一全国立下大功的故明降官降将贬作“贰臣”，意外地造成南明史研究变相开禁，那时有关南明的历史陈述早已残缺混乱不堪。当南明的课题在本世纪前期再度提上历史研究日程以后，人们发现如同研究十七世纪即明亡清兴之际所有课题一样，对南明那十八年的研究，也必须从清理基本史实做起。

清理南明的基本史料和历史事实，吸引了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给予的关注。章炳麟、梁启超、孟森、陈垣、胡适、钱穆、萧一山等，都早已发表引人注目的论著。日本学者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的但焘中译本在“五四”前夜出版，也起过推波逐澜作用。久享盛名的大史学家陈寅恪的晚年巨著《柳如是别传》，更提供了一个实例，显示即使在一个“点”上清理历史事实，也何等不易。

或许这正是南明史研究缺乏综合性专著的原因。自从一九五七年谢国桢的《南明史略》出版以后，至今在国内未见再有类似专著问世。谁也没有想到，这几十年来，域外的汉学家已在南明史领域下过那么多功夫，终于导致首部英文版的综合性的《南明史》，在一九八四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刊行，并立即引起国际汉学界的广泛瞩目。它的作者为美国印第安

纳大学的司徒琳教授。

还在研究生时代，司徒琳(Lynn A. Struve)便为南明时代的历史复杂性和研究的艰苦性所吸引，毅然放弃了已见成绩的文学研究，选择《历史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清代史学中的南明》作为博士论文的课题，并为此再赴台湾和日本进行长期研究。这篇优秀论文使她于一九七四年成为密执安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嗣后再经十年孜孜不倦的潜心研究，终于完成了这部杰作。

说它是杰作并非夸张。作者征引的文献，包括国内外现存的有关南明诸政权的大量记载，以及本世纪中外学者的研究论著，是那样丰富。况且作者也不以直接引用为满足，而是对于征引的古今文献都细加考证，以确定其可信程度。这使本书的注释与正文结合成为相当严密的整体，再辅以详尽的参考文献目录，也使本书堪称读者了解南明信史的佳制。

以往我们的南明史论著，包括通史或断代史著作的有关篇章在内，常给人某种先立论、后举证的印象。将满汉间的民族冲突化约为爱国与否的斗争，将南明诸政权的建立简单说成人民群众支持的结果，而对于那些政权本身的考察反而语焉不详，便是我们常见的陈述模式。司徒琳显然不满意这样的陈述模式。她的《南明史》将考察重心置于这些政权本身。她认为本书所考察的南明四政权是明朝世袭君主统治在首都失陷后十八年内的继续，因而也是导致明朝统治由强变弱的两大难题造成的内在困扰的继续。那两大难题便是“文武之间无法取得统一和协调”、“大臣们在如何作为皇帝的辅弼问题上陷入了困境”。正如本书引言最后所强调的，作者并不认

为这是把明朝引向灭亡的唯一矛盾，“同等重要的是前近代经济变迁的多重因素也在起作用”。但作者所以将视野主要放在那两大难题的纠结不已上，是因为她认定历史事实已明白昭示，正是处在生死关头而这种纠结造成的内部冲突反而越发严重，招致了抵抗运动节节失败和各个政权逐一死亡。人们自然可以对这样的见解提出异议，但倘若仔细通读全书，便很难否认那是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的一个角度。

如同许多西方汉学家一样，司徒琳研究中国历史，力求保持客观的态度，而竭力避免对于个别人物和事件作出褒贬式的评价，尤其注意南明那些不同人物面对传统难题交替出现时的角色变换，或者说在实际历史进程中的心态和行为的变化过程。这使本书关于中文论著中常有定评的那些人物和事件的陈述，经常显得与众不同。见解本身可以讨论，但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种严谨的学者态度。多年来，我们的历史研究，过度热衷于所谓历史人物的评价，过度注目于某些历史积案的是非，而对于过程本身却往往不加细察，这能说不是非历史主义的态度吗？

司徒琳的《南明史》，原著以叙事细腻，风格简炼，文字优雅著称。承作者好意，在三年前中译本初稿刚出来时，便要我帮助审订。我是相信严复所立译书需要信、达、雅三准则的，而以为首要的是信，即准确表达原著的文意。作者的中文造诣本来很高，完全有能力自行校订，但仍以为中文译本由中国学者校订可能更宜于中国读者。校订改译的经过，作者为中文版写的后记已予说明。这回我再次应邀访问印第安纳大学，译稿已全部完成，于是不得不兑现诺言，通读之余，对译文作了若干修改，还是希望既信且达。至于是否给

原已改订得很畅达的译文，略增雅意，抑或反而佛头着粪，那就不敢说了。

但我相信，司徒琳教授这部《南明史》的中译本，列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海外汉学丛书》中作为一种出版，必将受到学术界同行和读者的欢迎。关心南明史的读者，有了一部深入浅出的好书可读；研修明清历史文化的青年学子，增添了一部**系统性强而内容丰富的参考书**。而研究明清史的学者们，不论对于本书的内容、结构和见解作何估计，想来都愿意一读的。因为本书在美国纽黑文和英国伦敦同时出版以来虽已有七年，但至今在欧美汉学界仍是关于南明的完整历史的唯一专著。我们至少可从中窥见海外说英语的同行们在这一点上的研究现状。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高级学院

英文版序言

司徒琳

(Lynn A. Struve)

众所周知,直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学者才使用“南明”这一称谓^①。在十七世纪把受了致命伤的明朝取而代之的清朝,此时其本身亦已“内忧外患”交相困扰,步入了最后的几十年。“南明”一词的晚出是可以理解的。此词与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对其他朝代、尤其是对南宋的称谓一样,意味着对某些政权表示尊重,视其为正统。而清朝官方对这些政权的态度是尽量予以抹煞。大多数清朝学者提及1644至1662年这段时期,总是称为明末、明季、南疆,或是用前朝亡国的典故以为暗示。但是在二十世纪头十年,清朝推翻,民国肇造,反满情绪随之而起,于是南明一词广泛使用。不过,本书使用此词,只是为了行文方便,无意赋予这一时期以特殊的地位。要是另有用意,那也只不过是表明对这一历史研究课题的尊重而已。

西方学术界对南明几乎没有什么研究。过去十年,无论是质还是量,对十七世纪中国的研究大有进展,但是有关该世纪中叶的历史却是一片空白。这种对南明反清朝征服中土的忽视或回避,原因或许在于,卷帙浩繁的原始资料不是分散零乱,就是颇有问题。1970年,我还是研究生,即已开

始思考这些问题。1974年，我提交博士论文，也涉及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②。尔后十年，我一直觉得这些问题令人烦恼。但是在这几年中，有关的参考书目我已有所掌握，对于哪些著作是南明原始记录也所知颇多，我尽量使本书立足于最可信的资料之上。这些资料不是出于亲历目睹者，即是出于事后不久作辛勤搜求者，我摒除了大多数清人的第二手和第三手资料。对于道听途说之作，即使出于我所喜欢的作者之手，也不予引用。因此，对南明史有所知的读者会感到惊奇，在我的注释和引用书目中，一些人所熟知的著作极少出现，甚至绝不提及。我不能说，有关南明的第一手好资料，我已搜求殆尽。遗漏在所难免，而且有些重要著作我无法获得。至于大量的二十世纪南明史著作，大多供新闻与宣传之用，因此只引用在我看来其中最具有学术价值的那部分。

中国人如何写南明史，此事本身就饶有兴味。从1640年到现在，中国史家一直把那个时代看作意义重大，他们的观察方法常有改变，这反映了三百四十年间中国学术环境的各种变化。这些变化有时微细，有时剧烈。要是我在本书中不时讨论，我对南明史实的处理方法与三百年来各种诠释相比，是彼此符合呢，互相偏离呢，还是走中间路线？那末，本书的叙述将会是迷雾一片。若是在注释中讨论有关南明材料真伪的大量问题，我会大大超出本书的篇幅。考虑到这一点，同时也为了满足同行的兴趣，我打算另写一本南明史学史，既作为中国史学的“社会学”研究，又可供资料指南之用。就目前而论，治南明史者可参考刊于《剑桥中国史》第七卷的有关南明书目的拙作。此外，他们定会和我一样感到高兴，已故谢国桢先生的《增订晚明史籍考》业已出版^③。

在整个中国历史中，十七世纪是头等重要的时期之一。数十年中酝酿而成的变化浪潮在该世纪中叶达于峰巅，而后浪花四溅，散为各种事件，既令人振奋，又使系统的研究与诠释甚为困难。大多数西方学者对此的注意力集中在相对稳定的早期和晚期，对于中期发生之事避而不谈。那些敢于探索中期状况的人所采用的方法颇值得赞扬。他们对地方一级的事件与变局作了细致观察，揭示了在某些地区诸种因素如何相互交错。此外，这些地区研究也揭示了人的因素，满足了我们想了解当时真相的要求。另一类著作是从经济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阶级对抗出发，地区研究颇得此类著作之助，不过并未受它们的束缚。更为传统的看法则重视政府官员是否具有道德与行政才能。另有不少著作描写有名的明朝忠臣以及其他各色引人注目的人物。这些看来是富于戏剧色彩的老生常谈，但是往往很符合那个时代。一位同行恰当地指出，“南明事件确实多采多姿。即使仅注意到最可靠的原始材料，各色人物和事件也令人不可思议。……”^④

我认为这些方法都有效，但又感到，只有众多学者以各种相关的方法作了大量研究之后，一部扎实的十七世纪中期的通史才有希望出现。此外，在我看来，由于对当时重大的政治与军事发展缺乏清楚而全面的解释，十七世纪中期史的研究工作不易进行。美国同行们把此一历史时期的研究工作集中在清朝方面^⑤，而我比较熟悉明朝方面的资料。因此我觉得，目前我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是写一部像本书那样的既全面又不铺陈的南明通史。至于明朝如何衰落，满洲如何成功，明朝的理学文化如何影响忠贞之士的行为，百年来社会经济脱序和政治动乱的关系如何，有兴趣的读者会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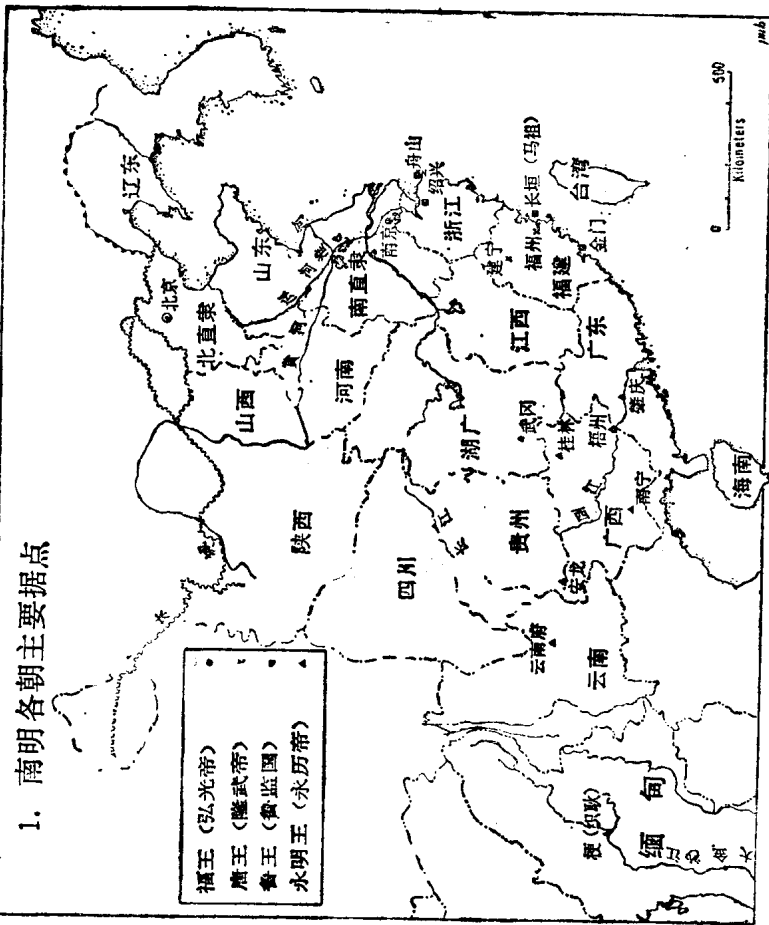
现本书有助于对诸如此类问题的了解。我设法适当地把这些问题显示出来，但回答这些问题不是我的目的。我宁愿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对这一丰富多采的时代作一个精确而又全面的观察。

地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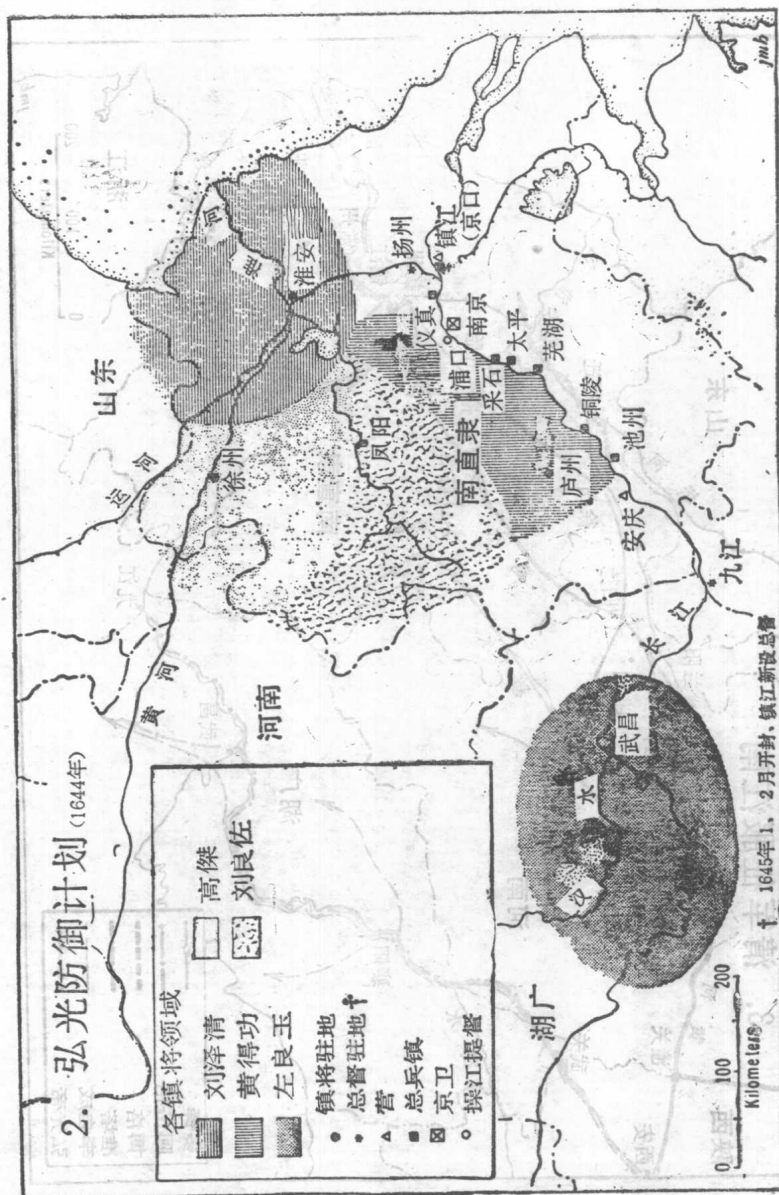
1. 南明各朝主要据点
2. 弘光防御计划(1644年)
3. 清军征服江南
4. 长江下游主要抗清中心(1645年夏—1646年春)
5. 鲁监国与隆武(1645—1646年)
6. 湖广明军据点略图(1645年冬—1646年)
7. 清军侵入浙东与福建(1646年七月——十月)
8. 清军首次侵入两广与湖广南部(1647—1648年)
9. 永历帝行踪(1647—1648年)
10. 鲁监国主要行踪(1646—1662年)
11. 李自成残部主力转移(1646—1649年)
12. 清军第二次侵入两广(1650年)
13. 李定国与孙可望的东进战役(1651—1655年)
14. 永历帝行踪(1651—1659年)
15. 郑成功主要行踪(1647—1661年)
16. 清军侵入贵州、云南(1658—1659年)
17. 长江之战(1659年)

1. 南明各朝主要据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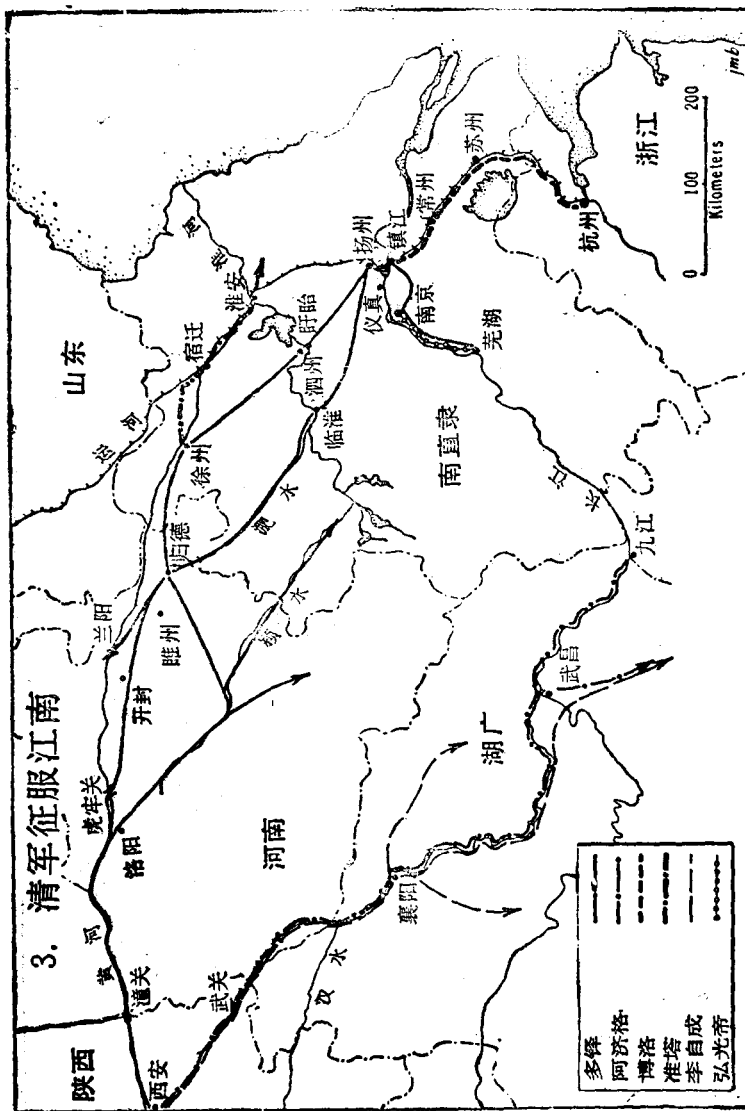
- 福王 (弘光帝)
- 唐王 (隆武帝)
- 鲁王 (鲁监国)
- 永明王 (永历帝)



2. 弘光防御计划 (1644年)



3. 清军征服江南



4. 长江下游主要抗清中心

(1645年夏—1646年春)

